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22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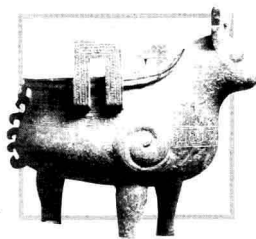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22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LSWXYJ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武汉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22 辑 / 周国林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ISBN 7-5622-2776-4/K · 157

I. 历… II. 周… III. 历史-文献-研究-中国-丛刊
IV. K2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6780 号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22 辑)

周国林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 李晓明

封面设计: 甘英

责任校对: 崔曙庭

督 印: 姜勇华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0.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读者如需邮购我社出版的图书, 可通过以下方式向我社咨询或查询。咨询电话: 027-67861321, 传真: 027-67863291, 我社网址: <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邮编: 430079



英斂之遺墨(王相伯攝)

此条幅“驟雨旋風聲滿堂”七字，为英斂之所书。苍劲有力，流丽自然。署名斂叟，用印二，一曰“斂叟疾薄藏后作”；一曰“万松野人”，皆篆字。清宣统三年(1911年)，英斂之患病二月，此为大病初愈后所作，徐对辛亥革命前夕国内形势的分析，精辟得当。此条幅现由华中师范大学王瑞明教授收藏，惜已破损，其中“雨”字破损最严重。

英华(1827—1926)，字斂之，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创办大公报、辅仁大学，与马相伯、陈援庵交谊颇深。著有《也是集》、《也是集续编》、《安蹇斋丛残稿》、《万松野人言善录》、《劝学罪言》、及《敝帚千金》等书，是一位反帝爱国的明智之士，是一位热心教育、新闻事业的时代哲人。

(本刊编者)



马相伯先生百岁遗墨

(采自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上智编译馆，1947年)

马相伯(1840—1939)，名良，江苏丹徒人。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与其弟马建忠合著《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语法专著。辛亥革命后，一度任北京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不断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团结抗战，是一位反帝爱国的著名教育家。

(本刊编者)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瑞明 邓瑞全 来可泓 李晓明 杨 昶 张新民
周少川 周国林 郝润华 顾志华 曹书杰 戴南海

主 编 周国林
常务编委 王瑞明

编委会通讯处:

邮 编: 430079

地 址: 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电 话: (027) 67868294

目 录

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周少川 陈晓华 (1)
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问题	冯浩菲 (9)
谦与静	
——论王导、谢安实践道家政治哲学的不同特点	马良怀 (18)
唐代史学考辨拾零	瞿林东 (30)
由诗本义看孔子诗论	
——上博楚简《诗论》第六章解读	黄怀信 (36)
荀子社会历史观论略	王 勇 (50)
历代谱牒及其编纂机构	陈蔚松 (63)
史志目录三论	张子侠 (77)
滇楚历史文化关系述论	古永继 (92)
荆楚笔记的文化解读	郑天一 (106)
从《魏书》看魏收的民本思想	庞天佑 (117)
刘知几与历史考据学	杨绪敏 (128)
唐代家训文献述论	赵 振 (141)
略论北宋之馆阁校勘	汝企和 (151)
六经图碑述考	吴长庚 (159)
试谈《明史》编修中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王记录 (173)
中西交通史权威方豪教授	王瑞明 (187)

《周官》时代问题平议	葛志毅 (198)
读《左》偶识	鲁毅 (214)
《左传》札记五则	周洪 (223)
论《孝经》的作者和成书时代	陈一凤 (233)
《管子》分组探源	张固也 (244)
论《史记》对“数”的承传与组合	徐日辉 (257)
《史记》兵法考索	张文安 (274)
《汉书·百官公卿表》校读记	赵生群 (287)
《文选》敦煌本残卷篇目校议	方向东 (298)
皇甫谧《高士传》浅论	彭忠德 (311)
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万里 (317)
简论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诠释宗旨	董恩林 董美春 (325)
赵崇祚家世考述	闵定庆 (335)
“巴渝舞”考略	王雄 (349)
杜诗巴地考	郭殿忱 张林 (357)
缘于性情 出于天然 ——一部隽永的古代游记《入蜀记》	李剑雄 (369)
王同轨《耳谈类增》述评	吕友仁 孙顺霖 (385)
明人史著编年考补	钱茂伟 (394)
国家图书馆藏《南明史料书目》述介	耿素丽 (406)
法式善《陶庐杂录》对目录学及人才、 人口问题的论述	姚晚霞 (418)
简帛疑辨(二则)	杨昶 (428)
斧斤与斧斲考误	喻凡 (432)

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周少川 陈晓华

世纪之初，我们召开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术研讨会，既研究地方历史文献，又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总体建设进行思考和研究，目的在于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新世纪我们学科的发展，以求开辟新的天地。顺着这样的主题，本文拟就 20 世纪学科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存在问题以及 21 世纪历史文献学发展的方向做粗略的探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与不足

白寿彝先生说：历史文献学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按照他的总结，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实际工作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然而真正建立起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即 1928 年由郑鹤声、郑鹤春兄弟撰写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与此同时，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开展史学研究的同时，集前人及自己文献考据的实践经验，用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操作和成长的专学，其中尤其是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最为典范，从而不断扩展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内容，为历史文献不断充实完善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历史文献学迎来第二次发展完善的高峰。在学科建设方面，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吴枫

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在 1982 年出版，二书在数十年文献学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对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类书、四部书、丛书、辑佚、辨伪等作出了较系统的梳理，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文献学学科涉及的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白寿彝先生，更是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论上构建了运行系统的框架。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分为理论部分、历史部分、分类学部分及应用部分四个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历史和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有关学科等问题。^①另外，白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意义，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等问题，^②为历史文献学建构了理论框架。在文献整理实践方面，除了整理出版了数千种古籍单行本外，更有一些超级大工程令世人瞩目，50 年代以来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标点就不用说了。自 80 年代以来，更有号称“十全大补”的古籍整理点校工程，其中包括《全宋文》、《全宋诗》、《全辽文》、《全金文》、《全元文》、《全元诗》、《全明文》、《全明诗》、《全清词》、《清文海》以及《全唐文》，近些年又出现了选辑、影印为主的四库系列丛书，北大的《四库存目丛书》，上海图书馆等集体编的《续修四库全书》，王钟翰的《四库禁毁丛书》，还有《四库未收书丛书》等。

总而言之，20 世纪文献学在学科建设和实践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肇始于 80 年代的文献学第一次发展热潮，在九十年代逐渐没有了后劲，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文献学本身而言，我们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脱离”，局限了文献学的纵深发展和广泛发展。

第一，是文献学研究脱离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交叉。举与

文献学最为切近的史学、考古学而言，20 世纪下半叶地不爱宝，大批的考古文物和地下文献被发掘，改变了以往人们在文献学中的一些传统看法。比如，辨伪学方面，历来被疑为伪书或以为不存在的《孙臆兵法》、《尉繚子》、《晏子春秋》，通过 1972 年的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证明确有此三书；再比如近些年大量战国简（如较近的郭店楚简）、秦简、汉简、三国简等的出土，竹简的制作体制，即长宽、个简的字数，编连的形式已经非常清楚，然而各种文献学著作或教材，均未对所收各期竹简书的体制作系统清晰的总结。简帛书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使用的时间与文献学论著中关于简帛书史的论述出入很大；又比如历来文献学叙述文献发展史，总是认为自东汉蔡伦以来，纸的使用逐渐普及，三国时纸写本已较多，可能还有一些帛书，竹简的使用应该很少了。然而，前些年长沙走马楼十万多枚三国简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三国时期，竹简的使用量还是很大的，如此等等。对于 20 世纪以来这些重要的发现和新的信息，我们文献学论著或者教材，几乎少有涉及。1993 年发现、1998 年正式公布的“郭店楚简”，使我们知道《老子》书的源头至少有三种，郭店简本《老子》与传世本《老子》和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它们在内容和编排上都存在极大差异，然而这只是一些搞思想史的、考古学的以及古文字的在进行对比研究，而搞文献学的却涉猎极少，极少利用新发现。

第二是文献学学科研究与社会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很多经济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古代文献等待我们去研究。这些姑且不论，就是我们学科比较接近的社会实际，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中的书文化持续升温，买书、读书、藏书、出书，这些都与我们的学科相关，如何总结古人爱书、惜书和治学精神，如何总结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成就和经验，这对于藏书文化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历史文献学专业

的研究可能做得比较少，很多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去做。此外，出版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国有六百多家出版社，每年出版图书八万多种，图书市场极大。那么在出版史方面，我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什么优良传统，有什么可供借鉴和吸收的遗产和经验，这些都值得总结。最近国家出版总署组织的一个重点项目《中国出版通史》，对出版事业做了个全面的清理，其中要讨论什么是出版、中国古代什么时候有了出版、何时有了雕版印刷技术，这些关系我们出版事业实际的问题，我们文献工作者理应率先关注。

二、21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展望

进入 21 世纪，中国学术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面临新的开端、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历史文献学怎样才能不负厚望，持续发展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抓好学科各方面的基础工作外，还应克服以往的不足，处理好四个方面的结合。

1. 促进文献学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 (1)开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不仅从内容、体例，还是产生流传的时间，甚至关于字体、简帛的形制等等，都应该通过有关比较，改变或增添文献学的内容。从银雀山汉墓到马王堆汉墓及郭店楚简，都有大批出土文献能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如《孙臆兵法》、《尉繚子》、《晏子春秋》、《周易》，郭店楚简的《老子》、《礼记·缙衣》、《五行》都可与马王堆的帛书本、传世本，或上海博物馆整理出版的战国简本，进行比较或校勘，从而整理出更符合古书原貌的典籍。

(2)历史文献学要开辟新领域，创建新的分支学科，加强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比如自居延、敦煌汉简出土以来，出土的档案文书逐渐增多。最近传来消息，2002 年 6 月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又出土大批秦木简达 3 万多枚，是秦始皇时期的县府档案，非常珍贵，媒体称，据这些材料可以改写秦史，比如，竹简中有“洞庭郡”的

记载，这就使秦郡的设置由原来已知的 36 个郡增为 37 个郡；另外，竹简中还反映了大量秦代行政、邮传、经济方面的信息，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学学科应该建立古文书学学科，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对简牍的书写格式、内容类别、收发渠道、档案功能、时间地点和简牍形制等等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2. 文献学要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众所周知，文献的产生、聚散，文献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密切相联的，因此，文献学史的研究如能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会相得益彰，有利于加深文献学史研究的分量。比如有些学者近些年所做的古代和近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如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 1999 年版）、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现代出版社 1999 年版），就是文献的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结合的典型，他们的成果，“视野开阔，整体关照，都将藏书视作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着眼点虽在藏书，但目光却是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深层变迁，这种文化视角采用是自觉的，比如后两书都在卷首的绪论中对以前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然后解释采用文化视角的必要性。这种探讨角度的转换无疑对中国藏书文化会有更新更深入的认识”^③，其中，《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一书更是体现了文献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的道路，它“将私家藏书视为中国古代一种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自觉采用文化的视角”，其研究角度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观点的变化，以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此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作者对古代私家藏书与社会历史环境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一问题以前涉及较少，作者结合丰富的古代藏书史料，详细论述了政治经济条件和学术文化演变对藏书文化的深远影响，

探讨了北风南移和私家藏书文化中心的转移……对古代藏书楼、藏书章、藏书习俗、藏书嗜好等问题，以前只是作为典故趣话来谈论，但在作者眼里，它们都是古代藏书家文化心态的生动见证，对于揭示他们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不是文化视角的采用，是不易发现这些问题的重要价值的”^④，由此可见，走文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的道路，将是有源之水。

3. 文献学研究要与学术史研究紧密结合。以往文献学只顾讲校勘学史和注释学史，学术史只顾讲要从主观分析，各讲各的，成为两条道上跑的车。李学勤先生对学术史这种状况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术史不仅要从思想、义理的角度去写，还要从文献、史实的角度去写，两者不可偏废。^⑤这种看法极其重要，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就要看各个时代的各种经典的注释、校勘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从校勘注释的内容看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看学术史的转变。不同的版本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文献学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学术史的说明，另外，李先生还谈到学术史研究中的史实说明，这就是要作学术史上学术产生时代、发展阶段，尤其是不同学派形成发展进行说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实际就是学派史，这方面的研究和陈述不多。李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史》11卷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陆续出版了，我们期待着从中得到文献学史和学术史研究结合的启示。

4. 要结合开展深入的专学研究。(1)开展专体文献的研究。这包括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以及其他史籍的专体研究，如王锦贵对纪传体文献进行研究的成果《纪传体文献研究》（北大出版社1996年版），便是典型的范例。(2)专学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史的专学范围甚广，既可有中国历史文献学本身的专学研究，也可包括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这些学科的研究，有的可以从整个学科的研究来进行考察，有的可以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范围更小一点，可以考察某一个断代的专学发展史。

专学研究主要包括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以及辑佚学等研究。这些专学研究都可以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一方面深化他们以往的研究内容，一方面开拓新的生长点。比如，在目录学方面，应考虑如何应用互联网，联合各地图书馆收藏的古籍目录，形成全国现存的古籍全目。在目录学研究，无论是方志目录、书业目录、私家藏书目录，还是未被深入开掘研究的领域，都应该有纵深研究。另外，在运用方面，如何利用古籍目录来校勘、鉴定、考辨和整理古籍；如何利用古籍目录来进行学术史的研究，目录学也应提出新的设想和导向，在校勘学、辨伪学方面，校勘思想、辨伪理论的系统研究也还很薄弱，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3)专书研究。专书的流传考订为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因此专书研究需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作整体研究。要从卷帙的分合，内容的变化，书目上的不同著录，以及注释内容的发展，考察某些重要专书在各个时期的流传过程中所带有的时代特征，考察某些重要专书的传注、笺疏在学术思想上对原有著作上的延伸和发展，为人们提供可资借鉴和利用的内容，对学科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这部专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达到的水平，为中国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4)专人研究。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而已”^⑥人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主体，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人物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也应重视专人研究，对历史人物、专业人物进专门研究，如对历史文献作出卓越贡献的刘向、陈垣等人进行的专门研究。专人研究其中又包括历史文献学的学派研究，柯平在《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郑州大学学报》2002·2）一文中分文献学派为：校雠学派，包括版本校勘学，全面校雠学、义例校雠学、考证学、辨伪学；目录学派，包括藏书目录学、史志目录学、佛藏目录学、版本目录学；广义校雠学派，包括正义和文献编纂整理两大类。柯先生

的分类，且不说按校雠学派、目录学派或广校雠学派区分是否合理，校雠学和广校雠学派如何区分，就以所分的史志目录学、版本目录学 and 校勘学、考证学、辨伪学来看，实际是一些分支学科，并无学派特征。学派的形成，必须有追随者和权威人物，有异于其他学派的路线和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集结在共同学术路线下的队伍。如宋元学案中，“晦翁学案”，即晦翁学派，讲朱子理学朱熹学派；象山学案，即象山学派，讲陆氏心学陆九渊学派。由此观之，柯先生的分列，似乎还不能称学派，至于如何区分，留待它文探究，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文献学学派的研究是今后特别要注意的路径。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设任重道远，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既要传统历史文献学史作深入开掘，如对出版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断代文献学史做深入挖掘；又要集中力量探讨跨学科研究。只有注意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才能充分发挥文献学的学术作用，同时也为学科本身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前景。

①②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版，第558—559页，第507页。

③④准若：《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新收获——评三部新出版的中国藏书文化论著》，《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2期，第16页。

⑤《李学勤谈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中华读书报》2001·8·15。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119页。

（本文作者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
陈晓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生）

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说问题

冯浩菲

—

《论语·里仁》篇（以下凡引《论语》只出篇名）云：“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于曾参学习非常笃实认真，对于孔子的教导必一一进行研究、实践，花的功夫多，效果也显著。孔子欲其由博返约，以简驭繁，故因材施教，特意点化道：“吾道一以贯之。”是说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言下之意是只要掌握了这个基本思想，就可以事半功倍。曾子真积力久，一经点化，便一下子明白了孔子的意思。因此孔子出去之后，别的同学问及孔子的话是什么意思时，曾子便脱口说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罢了。孔门师徒的这一段对话表明，孔子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个基本思想便是忠恕。可见忠恕思想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

那么，到底什么是忠恕思想呢？幸好孔子自己曾有解释在。《卫灵公》篇云：“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恕道所包括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恕”的含义。“恕”这一言而可以让人奉行终身，说明其相当重要。这恰好可以印证“吾